清史研究前沿

咸同之交江南的战局与政局：以吴煦为中心

任智勇

[摘要] 1850年代中期，江浙官绅集团逐步形成。该集团以吴煦为首，与代表中枢权威的何桂清等人有良好的合作。在这个时期，该集团在财政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一度借太平军内讧，维持了江浙政局的稳定。1860年，再度兴起的太平军大败何桂清，曾国藩主政江南。借咸丰帝对何桂清的不满及江浙官绅对何氏的庇佑，曾国藩与李鸿章逐步整饬江南官场。吴煦虽有心投靠湘淮系，却终被逐出官场。湘淮系虽握有武力，也有自强的话语，但因与江浙官绅交恶，终未能在财政方面有更大的突破，成为他们自己和清政府日后政局转变的桎梏。

[关键词] 吴煦 何桂清 曾国藩 咸丰朝

[中图分类号] K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3－0042－15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沿江东下，进入江南地区，从此与清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拉锯，使清政府财政几近崩溃。在此期间，因江南地区的鏖战与开埠后对外贸易集中于长江一线等多重因素，东南财赋进一步向上海地区集中，并跃升为清政府最大的税源地。在这混乱的局面中，有两个政治事件值得注意，即江浙官绅集团的形成，湘系的东扩并最终排除前者。

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个时期反太平天国势力的研究多集中于皇权（尤其是祺祥政变），[①] 或者是湘淮军系统首领，对于非湘淮系统的清政府方面多付阙如。[②] 此时的江浙官员中，除何桂清、薛焕、王有龄外，吴煦也较为活跃。他不仅积极参与清政府与列强的交涉，控制中外混合的洋枪队，还是咸丰九年到同治元年（1859—1862）重要的财权掌握者：控制着江海关和上海地区厘

[收稿日期] 2023-11-08

[作者简介] 任智勇（1973— ），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教授，厦门 361005，rzy1973@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江海关关税收支情况研究”（19BZS059）和福建省教育考试招生重点专项课题《人物研究与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近代史通识教育》（FJJYKS23-16）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王开玺的研究成果：《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考论》，《北京社会科学》2011第4期；《董元醇述论》，《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东方出版社，2014年。

② 据笔者所见，较为出色的研究著作是龙盛运的《向荣时期的江南大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关于这个时期何桂清的研究，可参阅董蔡时：《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王建华：《论何桂清与江南大营》，《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另外，王佐（《两江总督——何桂清》，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对何桂清的生平进行了梳理。

捐等多达400余万两的税款收支。此外，他长袖善舞，是江浙官商来往的重要中间人。遗憾的是，关于吴煦研究目前仍显不足，也未能从吴煦出发揭示出当时江浙与湘淮系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拟以《吴煦档案选编》和相关档案为基础，探讨以吴煦为中心的苏南战局、政局的变动，以求教于方家。

一、吴煦与江南财赋的东移

吴煦（1809—1872），浙江钱塘（今属杭州市）人。他早年以幕府捐纳出仕，署理过震泽（民国并入吴江县，今苏州吴江区）、荆溪（今宜兴）等江苏多地的县令。

道光三十年（1850），时任署震泽县令的吴煦第一次“登达天听”，可惜不是好事。这年的十月二十八日有商人被匪徒冒充“查拿鸦片”，登船劫走10 900余两的财物，吴煦和其他文武官员接到报案后的两个月内仅抓获6名盗匪，拿回的财物也仅1000多洋元。江苏大员发起弹劾，以“捕务懈弛”为由，奏请将他们“摘去顶带……交部先行议处，仍责令迅速严缉赃盗”。[①]咸丰帝基本同意，并加上一条“倘再延玩，即著严行参处”。“文下吏部后，议复的结果是“降一级留任”。经过一番操作，虽然案件无所进展（无论是案犯还是盗赃），督抚们仍于咸丰元年八月以“于疏防限内获犯六名，计已过半，兼获首盗，尚知愧奋”为由，奏请让吴煦“开复顶带”。[②]咸丰八年闰八月初九日奉旨，吴煦“开复顶带”。[③]这一年，吴煦离开震泽，到了苏州，在江苏巡抚衙门待了一段时间（“趋承省局”）。[④]他这番转危为安的遭遇，大致可以认为吴煦不仅有一定能力，且已打通上层关系——虽然此时他自身级别很低。更可见吴煦“沟通”能力的是咸丰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的奏折：督抚们称赞他在上述事件中“不分畛域，首先拿获邻境问拟斩枭首伙盗犯”，奏请将其“照例送部引见，以示鼓励”。[⑤]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案件进展不变，但吴煦不仅处分没了，还受到奖励——要进京见皇帝，并很可能升迁。现在所知的是，咸丰二年初，吴煦随海运漕船一起到了天津。[⑥]可惜的是，现存的履历折没能找到吴煦进京引见的记录。因为引见需要漫长的等待，而吴煦早已以能力见长，连素有声望的江苏按察使桂超万也与之交好，[⑦]在江苏官场不乏补缺的机会，所以他很快返回了江苏。从现存资料来看，大致可知吴煦自京师回江苏后虽然没有升迁，但署理了多任实缺：如咸丰二年九月署理荆溪县令，[⑧]咸丰二年底至三年初署理金坛县令，[⑨]咸丰三年七月还差点署理了嘉定县令，只因上任前民变而未能成行。[⑩]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在江苏官场建立起不小的关系网，这个网络能为他提供除了官面文章之外的重要信息，如咸丰三年二月江宁城被太平军围困后，好友贾益谦告知吴煦城内各大僚的丑态（总督陆建瀛“失足而跌，语言不清”，布政使祁宿藻“吐血”）与城池无可防

---

① 《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注明外，均藏该馆），档案号：04-01-01-0846-042。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奏，档案号：03-4088-028。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朝上谕档》第1册，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④ 《吴煦致朱朴山函》（底稿），1852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7-148页。这个“省局”在信件中不见详细记载，从上下文看应该是负责漕粮海运的临时衙署。

⑤ 《宫中档奏折》，咸丰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档案号：故宫120569/406001824。

⑥ 《章惠致吴煦函》，1852年5月28日，《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128页。

⑦ 桂超万（1784—1863），安徽贵池人，48岁中进士，后出任地方官，有政声，林则徐评其“行出许多善政……能以经术为治术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78，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63—13064页。

⑧ 《吴煦上联英禀》（底稿），1852年，《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142-143页。

⑨ 《吴煦为力行保甲致金坛县绅董照会》（底稿），1853年2月15日，《吴煦档案选编》第1册，第117-118页。

⑩ 《吴煦致星桥函》（底稿），1853年8月29日，《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154-156页。

守的实际情况。[①]

吴煦自有其气运，在咸丰三年至四年江宁、上海失守期间都未立于危墙之下。咸丰四年十一月，吴煦就任了一个关乎他此后生涯的重要职位——署理松江府海防同知。[②] 松江府海防同知为繁难要缺，驻地在上海，本有防务职能，但明显这次调他出任此职另有安排——帮助处理漕粮海运，因为这个时期不仅江苏，浙江的海运漕粮也要从上海出海运京，工作强度和难度远超从前。吴煦在任表现无疑很好。他甚至超额完成了上级的任务。

咸丰五年三月，吴煦卸任海防同知。新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听闻其能，札调其前往镇江前线，并升衔“以知府补用”。年底，江浙两省均对其加以保举，“苏省以题补知府缺出酌量补用，浙省则保升衔”。[③] 可惜，这些已对吴煦无用。[④] 而在吉尔杭阿被太平军击毙之前的咸丰六年三月中旬，吴煦突然生病回苏州休养。病愈后，他回到上海，参与上海茶税的征收，[⑤] 查办上海城乡厘捐[⑥] 以及捐输事务。[⑦] 他自称这段时间“于役申江，专司捐务”。[⑧] 吴煦处理事务的能力得到了江苏官场的公认，时任苏松太道薛焕对他大力推崇：“当其任者，舍君其谁？”[⑨]“捐借之事，非得阁下襄理其间，断难成就”。[⑩] 到咸丰六年五月，吴煦掌控的厘捐事务自称已能每月提供 7 万两左右的饷银，[⑪] 咸丰七年六月后又负责丝茶加捐，每年约计 40 余万两。[⑫] 见到吴煦办事干练，作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心腹的王有龄，将上海各税厘、加捐等事务一并交吴煦管理。[⑬] 也就是说，到此时，吴煦掌握着每年近 200 万两的各式收入，这是江苏最重要、最大的税源之一，支撑着清朝在江苏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运行。[⑭]

以上关于吴煦的活动仅见于《吴煦档案》，而再在清政府奏折中见到吴煦已是咸丰八年底。此时，他的职衔仍是候补知府，正在上海“听候差遣”。他虽官职不高，但已进入两江总督何桂清的“法眼”。当薛焕协同钦差桂良、花沙纳到上海办理“抚夷”，无暇办理本职时，何桂清于咸丰八年十二月上奏，由吴煦越级“暂行护理”苏松太道，并得到批准。[⑮] 清代的官制中，护理意为：“凡上官公出不久回者，则由署员暂护其印、代为办事”，或“凡各官以下理上，以小理大，护其印务，皆曰护理。凡衔职相当者，则为署理。”[⑯] 从这份奏折可以推断：何桂清利用护理

---

① 《贾益谦致吴煦函》，1853 年 3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1 册，第 120 页。贾益谦生平不可考，其时当为候补官员，后任武进县令、松江府知府，一度署江苏臬司。

② 《吴煦高凤清查看浏河出口情形》（底稿），1854 年 12 月 28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166–167 页。吴煦在此过程中不仅帮助疏浚河道，还创立了船只白天装船，夜间出码头，后船跟进等办法以加快进度。

③ 《吴煦日记》，《吴煦档案选编》第 3 册，第 201 页。

④ 这些年中，每年江苏、浙江、直隶三省均有办理漕粮海运出力员弁和商人的请奖清单。惜未见咸丰五年江苏、浙江漕粮海运出力员弁的清单。此处为推断。

⑤ 上海茶税在这个时间段突然出现暴增，具体情况与茶叶假冒北运，实与海路出口沙俄有关。见《蓝蔚雯、吴煦为过沪北茶照西洋例纳税事谕江海关职吏》（底稿），1856 年，《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186–187 页。

⑥ 《吴煦等禀查办上海城乡厘捐情形》（底稿），1856 年 12 月 9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198–199 页。

⑦ 《吴煦等禀筹捐济饷及招商运米济沪》（底稿），1856 年 12 月 11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199–201 页。

⑧ 《吴煦禀开办洋货捐情形》（底稿），1857 年 3 月 21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15 页。

⑨ 《薛焕致吴煦函》，1856 年 12 月 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195 页。

⑩ 《薛焕致吴煦函》，1857 年 6 月 14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21 页。

⑪ 《吴煦、方传书致平翰函》（底稿），1857 年 6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20–221 页。

⑫ 《吴煦等禀丝茶加捐遵办各缘由》（底稿），1857 年 7 月 20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28–235 页。

⑬ 《王有龄整顿上海捐务情形禀》，1857 年 7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42–245 页。

⑭ 《何俊致吴煦函》，1856 年 12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206–207 页。构成上海厘捐大部的是城乡厘捐、丝茶捐、船捐，这些厘捐彼此无关，各设衙署，但总归吴煦掌控。到吴煦接管关税后，咸丰九年全年他实收的关税和捐款已经达到“四百十余万之多”。见《吴熙致吴煦函》，1860 年 2 月 6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362 页。

⑮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档案号：03–4372–002。

⑯ 内藤乾吉原校：《六部成语注解》，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0 页，第 169 页。

制度可“以下理上，以小理大”这一特点将吴煦扶上了苏松太道这个重要的职位。

吴煦显然没有辜负何桂清的信重，在数月内处理了数十起中外交涉事件，均能“得法”。① 吴煦已屡次“上达天听”，次年二月被要求与王有龄、薛焕一起协助何桂清处理英国公使驻京之事。② 护理沪道六个月后的咸丰九年六月初五日，何桂清显然对他非常满意，随即再上一折，认为“苏松太道一缺为中外之枢纽，非通达经权、声望素著者鲜克胜任”，不仅吴煦这个护理道员“遽难更易”，而且需要“将道员崇以体制”，奏请将吴煦的职衔从护理改为“署理”，“以重事权”。③ 何桂清的奏请很快得到准许。④ 吴煦此时还参与了劝阻英军北上的行动。⑤ 从相关奏折可知，吴煦大量参与了对外交涉事务。

吴煦则表现出了解列强，甚至与列强驻华外交官员有私交（如与法国副公使梅尔登）⑥ 等各方面的能力。至少从 1859 年起，吴煦还组织人员购买报纸，翻译资料，以了解外国公开信息：“现于营中密约暗中准备，以为预防之计；一面密购该夷各路新闻纸，按期雇人翻译，可得伊等实在消息，仍当随时禀报……” ⑦ 并进而刊印有关资料分发给各路大员，如前江苏巡抚时任光禄寺卿许乃钊就收到了“《夷人新章》大小共三本”。⑧

当然，吴煦对于情报的收集整理并不仅限于国外，甚至可以说对国外情报的收集是他对国内情报的延续。从吴煦编撰的《各地探报》收录内容来看，至少自 1853 年起已开始收集情报，收集情报的有专人，有僚属，有朋友；从地区看主要在江苏，少部分来自外省。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比较不系统，安排人员有一定随机性。⑨ 直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上海会防公所”成立之后，才有专职探子，每日从上海周边各地发回信息。⑩ 也就是说，大致可以认为吴煦有自己的情报网络，虽然不是很完善。

综上所述，咸丰十年（1860）前的吴煦虽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僚，但他处理各种政务的能力（包括理财、对外交涉）已在江苏官场得到认可，连续数任江苏大僚都对他青睐有加，他一步步地从从七品的候补知县升迁到正四品的署理苏松太道，从一个长袖善舞的候补知县攀升到呼风唤雨、掌握巨大财权的实权人物。

二、太平军东征前后的苏南政局

上节所述江浙政局都是建立于太平军与清政府军事平衡基础之上。何桂清等人并不知兵，或者说他们与此前的绝大多数清政府官员一样，将军事任务交给武将。当时江浙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是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从长江南北两侧逼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天京之乱”也是 1857—1860 年这数年间衰落的太平军与腐朽的清军双方保持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新一代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崛起，太平军击败江浙清军只是时间问题。

咸丰十年，李秀成带兵东征，佯攻浙江，破杭州，调动江南大营兵力，随即席卷苏南。两江总督何桂清时在常州，畏于兵锋，弃城而逃，甚至在逃跑过程中击伤多名“涕泣慰留”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九年六月初五日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奏，档案号：03-4142-137。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第 92-93 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九年六月初五日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奏，档案号：03-4142-137。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兼署江苏布政使署苏松太道吴煦奏，档案号：03-4153-059。

⑤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 336-337 页。

⑥ 沈渭滨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63 页。

⑦ 《吴煦上王有龄禀》（底稿），1859 年 7 月 8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5 册，第 60 页。

⑧ 《许乃钊致吴煦函》，1860 年 12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1 册，第 454 页。

⑨ 《各地探报》（1853 年 3 月—1862 年 6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3 册，第 233-301 页。

⑩ 《会防公所探报选录》（1862 年 1 月 28—1863 年 5 月 1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3 册，第 301-451 页。

的士绅。[1] 奔至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门不纳，遂逃至上海。常州、苏州也随即被太平军攻占。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在苏州失守后不久，自觉被欺蒙的清廷，认定何桂清“实属畏葸无能，有负委任。何桂清著即革职来京，听候审讯”。[2] 此后又于四月二十一、五月初一日多次下旨要求将何桂清起解赴京。驻扎上海的薛焕等人与何桂清关系密切，所以就有了以下的操作：六月十一日声称“札委江苏试用同知平履和护解何桂清赴京……严催迅速起程，勿任逗遛”，[3] 一面又于一个半月后的七月二十七日上奏称江南大营剩余的各级军官们叩请“何桂清赴营督剿，各军士均愿效死力功各城，为何桂清赎罪”。薛焕也于奏片中加入了自己的判断，何桂清留下可“俾军心鼓舞，益加踊跃用命”。[4] 而江浙官场出于对于何桂清的支持，对薛焕、王有龄挽留何桂清，拖延解京的做法也大体持支持的态度。[5] 他们以为可用拖延之计缓解甚至改变朝廷的愤怒。

然而，清廷已经彻底改变对何桂清的态度。一面是咸丰帝个人的愤恨，一面是朝廷有了其他的选择。咸丰帝的愤恨表现在接到何桂清辩解自己何以从常州退至上海的奏折中，于四月十九日连写三句批语：“闻风先逃！民望何在！该大臣既抵常州，有兵有将，声势自应更壮，何畏葸若此！”“无异于程矞采之奔回长沙。”“试问觅一粮台委员，顾总督之事耶！”[6] 两天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又有一道谕旨痛骂何桂清：“节节退守，置地方民生于不问，实属殃民误国。”[7]“平时无事，侈谈彼短。一旦决裂，尚不自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负书生两字。”[8]

其他选择在于朝廷决定打破江浙官场的“不分畛域”，给予曾国藩掌控江南的权力。四月十九日清廷下旨：“赏前任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以江苏巡抚徐有壬兼署。”[9] 因徐有壬已死于苏州，江苏布政使薛焕作为江苏唯一活着的在任省级高级官员，同日被任命为“署钦差大臣，办五口通商事”，并于五月初一日署两江总督。[10]

江苏官场的这次大洗牌对于吴煦而言并非纯然是坏事：薛焕高升后遗留江苏布政使，薛焕随即以江苏官场“乏员”，而吴煦“才敢明练，堪以委令”为由，于五月中旬札委这位可靠的合作伙伴署理江苏布政使。[11] 清廷不仅同意札委，还于七月二十六日赏给吴氏二品顶戴。[12] 五月十七日，吴煦接署江苏布政使。鉴于督抚们原来的驻地江宁、苏州均为太平军攻占，他随以筹饷为由，将驻地改为上海。就这样，他从捐纳出身，以署理道员晋身为一省大员，他在兴奋之余，在第一份谢恩折中有点语无伦次，居然自称“毫无知识”。[13] 十月二十九日，薛焕又以吴煦“自署事以来，已历两载，办理地方及通商事件均属妥协”为由，奏请将吴煦的署理苏松太道改

---

① 《清文宗实录》卷 317，咸丰十年四月乙酉。
② 《清文宗实录》卷 316，咸丰十年四月癸未。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江苏巡抚薛焕奏，档案号：03-4551-118。
④ 《宫中档奏折》，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江苏巡抚薛焕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档案号：故宫 131661/406012802。
⑤ 如乔松年也在年底的一封信中问及：“王雪翁奏留何制台一折，能否邀允？”王雪翁指王有龄（字雪轩）。乔松年此时仍明显支持何桂清。见《乔松年致吴煦函》，1860 年 12 月 31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387 页。
⑥ 《清文宗实录》卷 316，咸丰十年四月癸未。
⑦ 《清文宗实录》卷 317，咸丰十年四月乙酉。
⑧ 《清文宗实录》卷 317，咸丰十年四月乙酉。
⑨ 《清文宗实录》卷 316，咸丰十年四月癸未。
⑩ 《清文宗实录》卷 318，咸丰十年五月甲午。
⑪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署理两江总督薛焕奏，档案号：03-4152-101。此处五月二十九日为朱批时间，按照当时江苏与京师之间大致十二日的驿递时间，推测上奏时间为五月十七日左右。
⑫ 原上谕未见，引自《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兼署江苏布政使吴煦奏，档案号：03-4156-031。
⑬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兼署江苏布政使署苏松太道吴煦奏，档案号：03-4153-059。

为实授。①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在实授胡林翼湖北巡抚的同时，"命署江苏布政使吴煦帮办团练事宜"。② 于是，江苏的政坛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薛焕以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③ 吴煦以苏松太道兼署江苏布政使。而这两位江苏政坛中最高长官却是"不分畛域"，上下一体。④ 加上王有龄时任浙江巡抚，近在杭州，与他们有过共事，且相对愉快，江浙两省的主要官员几同一体。这种情况是以满人为主体的清朝所不愿看到的，也是即将主持江苏等"四省防剿"的曾国藩所不愿看到的。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苏南地区是太平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清军包含多种成分，既有从各地抽调经制军队组成的江南大营，也有苏南士绅自己举办的团练。从战力来说，团练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如曾国藩般坚忍的主事者，江南大营仍是对抗太平军的主力。为了保住仅有的"完善之区"，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包括上海在内的苏南官绅全力供应江南大营。而腐朽的江南大营成为财政开支的无底洞。吴煦等上海官僚自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维护上海地方社会治安，组织了一支兵额庞大、名目繁杂的勇营以及水上部队。吴煦等人也清楚这些勇营战力不可靠，于是与杨坊于 1860 年 6 月雇用、组建华尔的洋枪队。出于各种原因，这支内残外悍的部队人数不多，到 1861 年 11 月与围攻上海的太平军作战前仅 429 名，⑤ 到 1862 年底白齐文殴官夺饷之前，总数也仅扩张至 5600 余名。⑥ 这支部队与列强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关系密切，但在清政府的序列中明确规定："所有常胜军事务，原系正任苏松太道吴煦统率，前任苏松粮道杨坊会带。"⑦ 这支以洋人为骨干的军事力量成了吴煦等人最重要的底牌之一。

对于日后的吴煦影响重大的是，他会理财，但也很会花钱。由于湘淮系的资料流布甚广，江浙官场"挥金如土"却不给能征善战的湘军拨款的内斗行为几成定论。若留心当时江苏的开支史料，不难看到江苏方面同样面临财政窘境。例如，仅江北粮台"统计月需不下二十余万两"，因拨款不及时，粮台衙署门口士兵官弁"哀号咆哮而来坐索"几成常态，江南大营的开支则近四十万，也是拨款不足，"愈欠愈多"。⑧ 两处军营虽然名义上有全国各处源源拨款，但实际于各处所得甚少，主要依靠苏南、上海拨款。这也是我们在《吴煦档案》中可以看到两处不断有人以私人名义致函，恳请上海"以济急需而维全局"的原因。除了上述江北、江南大营的开支，上海周围也是局势混乱之余重兵把守，沪局兵勇粮饷"每月共需银七万数千两，加赏恤杂用各款约需银八万两以上"。⑨ 外间所见则是上海军饷供给之充足，多有不满之中的艳羡："上海

---

① 《宫中档奏折》，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档案号：故宫 132264/406013394。

② 《清文宗实录》卷 336，咸丰十年十一月丙辰。

③ 薛焕以署理江苏巡抚的身份暂署两江总督的时间是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九日，补授江苏巡抚是时间的五月初一日，正式离任江苏巡抚是在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薛焕在这近两年时间里其实是苏南的最高长官。见《薛焕传包》，档案编号：故传 009463。

④ 两淮盐运使乔松年称"抚台（指薛焕）统兵，与老兄尚无分畛域，犹可通融"。见《乔松年致吴煦函》，1861 年 5 月 8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432 页。

⑤ 关于洋枪队的研究，可参考罗尔纲：《常胜军考略》，《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于醒民：《早期华尔洋枪队若干史实》，《史学月刊》1984 年第 4 期。

⑥ 《吴煦详报入江人数船只及启程日期》，1862 年 12 月 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2 册，第 388–389 页。此前的研究以李鸿章《遣散常胜军折》为依据，认为总数是 4000 余人。（见《遣散常胜军折》，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98–500 页）误。李鸿章折所述人数实为调遣围攻金陵的人数。

⑦ 《致英国陆路提督士的佛立照会》，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第 173 页。

⑧ 《江清骥致吴煦函》，1860 年 11 月 4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380 页。关于江南大营的开支，江清骥称"北台用项不及现在南台之半"。

⑨ 《吴煦呈沪局兵勇大略数目》（底稿），1860 年 2 月，《吴煦档案选编》第 1 册，第 170–171 页。

月饷二十四万，丝毫无欠，谓尊处独有向隅之叹，不知敝处亦有霄壤之别。”[①]而吴煦自己对1860年底的度支情况总结为：“各路堵剿之师……所需粮饷，仅借关税、厘捐本已入不敷出，兼之江南粮台支应镇江及大江水师粮饷，因各省拨款未到，时虑饷溃兵哗，不得不随时搜括接济，勉为剜肉补疮之计……实系涓滴全无。”[②]李鸿章接掌江苏巡抚三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无款可筹，接受上海入款虽多，出款更剧的财政局面。[③]

总而言之，到李鸿章抵达上海之前，薛焕、吴煦、杨坊等在何桂清之后的江浙官僚集团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上海的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这固然是他们安身之阶，但他们没有来自朝廷的强力支持（何桂清自有军机大臣彭蕴章为奥援，但不属于这个群体），孱弱的军事力量也无法与身经百战且得到清廷欣赏的湘淮系相比。与此同时，他们掌握的财政是后勤脆弱的湘淮系所急需的，而吴煦等人早已将财物“挥霍”殆尽，所能给予湘淮军的很少。两个政治军事集团间结构性的矛盾绝非善恶、良莠之争，且无可避免。

三、湘淮系与江浙官场的龃龉及入主江南

在1861年派遣李鸿章率部进入上海之前，曾国藩与江浙官场多有龃龉：1855年就因向浙抚何桂清借饷分文未得而大怒；[④]1856—1857年间，湘军出征江西，屡有挫败，江浙方面不乏落井下石之举；1858年，湘系人物胡兴仁任浙江巡抚，仅一年即因倾轧而离任；1859年续任的罗遵殿也出自湘系，却被陷于死地，1860年3月死于杭州城。[⑤]此时，何桂清圣眷正浓，由浙江巡抚而莅两江总督，由太子少保升太子太保，不仅稳定了慌乱中的江浙官场，而且一定程度上笼络了江南大营等驻地军事力量。虽不能对太平军形成重大威胁，却也力保了苏南东部和浙江的稳定。而曾国藩系的行动中，也有很多不顾江浙方面者，如一直不愿派兵协防浙江等地，迫使江南大营和浙江军队被太平军来回拉扯，最终造成了太平军“东征”的成功。

浙江与苏南的“陷落”，是江浙官绅对湘军不满的重要因素。如宁绍台道张景渠就愤愤不平，将1860年严州（今建德）失守归咎于曾氏的“德政”。[⑥]苏南等地对湘淮系的排挤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当时普遍的情形，例如负责中外交涉事务之一的黄仲畬呈递公文时，就曾一度不给曾国藩，而只呈给薛焕。[⑦]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江南方面与曾国藩对于上海的地位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例如吴煦认为，上海需要重兵防守、善加保护的理由是：“惟上海华夷杂处，各省商贩辐辏，岁收关税厘捐不下四百余万，各路饷需大半赖此，洵为关系极重之区。”[⑧]曾国藩则认为：“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膏腴，于用兵为绝地。”[⑨]迥异的战略判断导致即使中枢认为“上海为饷源所出，关系东南大局”，[⑩]曾国藩仍迟迟不向上海方面派出援兵。

我们大抵可以认为：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努力与江浙官场之间的对立直至咸丰末年仍非常严

---

① 《复袁甲三》，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

② 《吴煦为洋药进出口税奏请留抵上海防剿兵饷事上薛焕禀》，1860年12月20日，《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383-385页。

③ 《陈明苏省兵饷片》，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561-562页。

④ 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0页。当然这并非何桂清、王有龄单方面的责任，曾国藩在信中放言指责浙江方面“挥金如土”。在这个手握税款即是主动的时代，甚至可以怀疑曾国藩在蓄意挑起事端。

⑤ 关于曾国藩与何桂清间的龃龉，可参见董蔡时：《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⑥ 《张景渠致吴煦函》，1860年10月31日，《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378-379页。

⑦ 《薛焕致吴煦蓝蔚雯函》，1860年3月7日，《吴煦档案选编》第1册，第176-177页。

⑧ 《吴煦为调吴淞营兵移驻上海填防禀王有龄》（底稿），1860年3月3日，《吴煦档案选编》第1册，第172-173页。

⑨ 《复黄冕》，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5册，第106-107页。

⑩ 《清穆宗实录》卷16，同治元年正月辛丑。

重，不仅曾国藩肆口痛诋江南人物，江浙官场中人也不乏对曾氏痛恨不已者。双方的怨仇已深，不可化解。但曾国藩没有就任两江总督后马上动手整顿江苏官场，自有其原因。

首先是清廷与曾国藩之间并非全然信任。例如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发布上谕，由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①] 曾国藩自不敢随口接下，而是“吁恳天恩，收回成命”。[②] 三让三辞本是君臣之间的仪礼，也是一种试探。谨慎如曾国藩自不敢贸然清洗江苏官场，他在等待机会。咸丰十一年十月左右，接连有人对薛焕、王有龄发起了弹劾，薛焕的罪名有“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且收买宝玩，性耽曲蘖……军务则不复一城，吏治则不办一事”。王有龄的罪名有“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对于这些弹劾，中枢均以字寄上谕令曾氏查核。[③] 曾国藩一时摸不清上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没有对他们大事攻讦，而是肯定他们理财、交涉之能，只是说他们没有领军办事之才。[④] 其意在剥夺薛焕等人的军权，进而完全控制江苏的军事力量。折上之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杭州城被太平军攻克，王有龄殉城，自勿庸论。而薛焕也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一职交给了还没抵达上海的李鸿章署理。在湘军迟迟不愿派兵进入上海保卫这个重要税源地的情况下，清政府未必没有其他想法，甚至一度以“上海情形危急，该处兵众四万有余，无镇将大员亲督统率，以致未能得力”为由，令冯子材“前赴上海统率各军……务当力加整顿，以战为守，严扼要隘，以保危城”。[⑤] 此时冯子材因驻地镇江与太平军激战，无法脱身赴沪。这个消息很可能刺激了曾国藩，以致当二月二十八日潘馥、钱鼎铭前来乞师东援时开始改口称：“镇江为进兵形胜之区，上海为筹饷膏腴之地。两者并重，均不可稍有疏失。”同意将李鸿章部搭乘上海方面运筹的洋船入沪。[⑥] 此间也可以认为，以吴煦与潘、钱等人的关系，他们乞师之举是得到吴氏认同（至少是默许）的。吴煦作为职业官僚已经接受与之素有嫌隙的曾国藩成为顶头上司的局面。

李鸿章于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进入上海，又于四月十五日正式署理江苏巡抚。[⑦] 至此，江督、苏抚两个最重要的职务都落入师徒二人手中，但中下层官僚仍是原班人马。在此之前的二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甚至以“俾地方与军务各有责成，而免旷误”为由，让新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暂不接印莅事”，请仍由吴煦署理藩司，[⑧] 以免与原班人马发生冲突。因此，曾、李二人并未马上动手排挤、弹劾，而是先行稳住吴煦。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四日给李鸿章的信中告知了拟对上海官吏采取的各项措施：主要是先不轻举妄动，等待时机。信中明确说明：“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因为唯一可以接手的郭嵩焘“芬芳徘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任以沪关，决不相宜”。[⑨]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曾国藩等人就有撤换吴煦以安排本派系人员的计划，但限于没有合适的人员，而将行动推迟。

从现有材料可知，这个时期对薛焕、吴煦的弹劾有所增加，尤其是同治元年三月的匿名折与五月的殷兆镛折。在匿名折中，上奏人罗列了上至薛焕、吴煦，下至苏州土棍费玉曾等官场上下“偷安纵恣，昏聩贪污”的种种风闻，奏请“饬下两江总督曾国藩秉公查办”。奏折中还对

---

① 《清穆宗实录》卷 7，咸丰十一年十月癸酉。

② 《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第 3 册，第 345–347 页。第二次任命和推辞是在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③ 原谕旨未见于上谕档，引自《曾国藩全集》第 3 册，第 339 页。

④ 《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第 3 册，第 347–352 页。

⑤ 《清穆宗实录》，同治元年正月辛丑。

⑥ 《李鸿章改由轮船赴沪折》，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 4 册，第 112–113 页。

⑦ 《初到上海复陈防剿事宜折》，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3–4 页。

⑧ 《谢弟国荃擢授苏藩恩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 4 册，第 97–98 页。

⑨ 《复李鸿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 25 册，第 169 页。

上海的官员进行了区别，认为上海县令刘郇膏“循声素著，最得民心……该抚意存嫉忌，未能尽其所长”。[①] 折上之后，三月十三日廷寄谕旨令曾国藩查办，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曾氏大营。三月二十七日，未等曾氏覆奏，朝廷升刘郇膏为署理按察使。[②] 但曾国藩收到匿名弹劾折后隐而未发，甚至都没有派人查办。

五月的弹劾折出自殷兆镛之手。殷兆镛（1806—1883），江苏吴江人（今苏州市吴江区），道光二十年进士，咸丰九年署兵部左侍郎，十一年丁母忧寄居上海，十一月间因上海受太平军攻击逃至嘉兴秀水县。同治元年正月返上海，四月初六进京，充上书房行走。从其自订年谱中可知，他对薛焕、吴煦不能保境安民颇有不满，[③] 于是就有了五月二十日的《在籍闻见折》。在奏折中，殷兆镛提出了“整饬戎行”“澄汰吏治”“清厘饷款”等五条，但他不是在说事，而是在说人，他非议了江苏、上海的诸多官员（刘郇膏除外），尤其是薛焕与吴煦。[④] 但在当日发出的廷寄上谕中，没有强调薛、吴二人的罪行，而只是“着曾国藩、李鸿章按照各条严密访查，并遵照节次寄谕办理”。曾国藩一时不知中枢的态度，而且殷兆镛的弹劾折对于薛焕、吴煦拟定的罪名不过是：“各省反侧，皆官逼之……薛焕统驭无能，诸难辞咎。吴煦精心计在上海开茂记、绂记、元盛、元丰等银号，凡缴捐非伊号银票不收，商贩沙船、火轮船及洋行存银甚多。”这样的罪名，即使坐实似也难以彻底毁去二人仕途，所以曾国藩依然没有任何动作，直到七月十六日才给李鸿章写信，“兹拟近日复奏，敬求迅速查示……敝处不另派员赴沪密查也”。[⑤]

在同治元年三月至八月底的这五个多月中，大体以稳住吴煦以免动荡为主，不去触动吴煦的权力范围。从李鸿章的奏折中来看，吴煦作为藩司的权力（如各项收支、海运漕粮、劝捐等）得到了他的尊重，称赞其能力与态度，以“竭力筹拨”[⑥]、“经手更久，熟悉情形”[⑦] 等词大力夸赞，迷惑吴煦，对于吴氏创办上海恤生局，“专收杭属男妇难民”也表示支持。[⑧] 李鸿章甚至对吴煦掌握的洋枪队管辖权也没有异议，调动所部去浙江时还使用了“暂借华尔兵六百名前往协守”[⑨] 这样的字句。当然，敲打也不是没有，例如要求吴煦对于各项开支“严定章程，议详复夺……浮费必须痛加裁汰，以节饷需”。[⑩]

当然，上述政治打击是一部分，还有重要的一环是清查账目。可能在曾、李看来，吴煦等人经手每年四百万以上的款项，其中必然多有不清不楚之处，于是就有了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对上海防剿饷需的清查。在札文中，李鸿章依据各项则例，指责吴煦“挪欠累累”“混销”“搪抵”。为此，吴煦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禀文，告知李鸿章上海方面的各项开支规则及收支来去，[⑪] 禀文后还有10余页的清单。针对李鸿章加诸其身的各项指责，吴煦将自己摘得很干净：在李鸿章四月十五日正式上任之前的各项开支，“大半奉文提支，非职道所敢抗违”；李鸿章上任

---

① 原折不可见，引文见《附参薛焕原折》，《曾国藩全集》第4册，第136–138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23，同治元年三月己酉。但实际保举人为翁心存，理由是“力保通泰，克复苏常”。（见《清穆宗实录》卷14，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甲戌）刘郇膏也于同治元年正月前升松江府知府。这也就意味着，曾国藩并非刘郇膏的恩主。他对刘郇膏后来也有一个不算太高的评价：“虽非拯救时艰之才，而崇朴黜华，素负民望。”（见《遵复薛焕吴煦参款片》，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5册，第72–73页）

③ 《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60册，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84–86页。

④ 原折不可见，《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所记与现存奏折差别甚大。本处引自《附殷兆镛原折》，《曾国藩全集》第4册，第325–330页。

⑤ 《致李鸿章》，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25册，第432–433页。

⑥ 《遵旨由沪拨给镇营兵饷米价片》，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16页。

⑦ 《仍责吴煦督筹松沪各军粮饷片》，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18页。

⑧ 《在沪设局抚恤难民片》，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67页。

⑨ 《洋将克复宁波片》，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6页。

⑩ 《遵查上海会防情形片》，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24页。

⑪ 《吴煦禀上海饷需入不敷出各情》，1862年7月24日，《吴煦档案选编》第6册，第520–527页。

后“专从四月十五日起另造按旬四柱折，一并禀呈钧览”。因开支过大造成的不合规（如挪欠等）问题，他解释为：

> 果可尽收尽用，不必分毫挪贷，既可洁身无累，又免后日艰难，职道求之不能，又焉肯为此笨伯。其奈应解应放，万不容任意拖延。欲求暂救燃眉，不能不设法挪贷，亦职道急公任事之愚忠，妄冀顾全大局，不忍坐视糜烂故也。今议者转视挪垫为多事，借款为私见，此因局外悠悠之论，亦未深知实在收放之数耳。①

吴煦指出了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收不抵支的情况下，若要维持局面，“挪贷”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他还干脆将事情挑明：让李鸿章“另派公正大员，将职道各年经手出入款项，彻底盘查，如有隐溷欺侵，听候参办，大局幸甚！职道幸甚！”李鸿章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但幕府中无人可用，没法从账目中发现问题，只能在度支问题上放过吴煦，没有更多地在这方面纠缠。这大概也是他后来留用吴煦帐下人才的原因。

综上所述，因战争的失败，吴煦的恩主何桂清不仅被褫职还引起了咸丰帝的愤怒。但何桂清的去职也给了吴煦更大的上升空间。他虽然留恋何氏主政时对他的“一力支持”，但对续任的曾国藩也表达了适当的善意。曾、李对他戒心甚重，毫无借重之意。吴煦之能留任除了自身在各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在于一时无人可以替代他。

四、吴煦的离场

如前所述，吴煦除了何桂清、薛焕的欣赏、举荐，并没有中枢高层的背景，他之脱颖而出，在江苏官场得以立足，以及清政府所看重的能力在于：掌握一支军队，善于对外交涉，擅长理财。曾国藩要彻底排除吴煦，就需要消除吴煦在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从史实来看，吴煦的最终离场也与他在这几个方面影响力的削弱有关。

在理财方面，曾国藩、李鸿章可选的手段就在于剥离吴煦，插手理财，也就是将吴煦身兼两职中的“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事务”一职剥离，让他成为空头的江苏布政使——反正苏州布政使实际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代替吴煦管理江海关的是他昔年的同事、湖南人黄芳，而黄芳的从兄黄冕正是湘军干将。②

在对外交涉方面，李鸿章自己逐步熟悉涉久事务，同时，其他人如刘郇膏等人也似足以应对。同治元年十一月与普鲁士签订条约，李鸿章就依靠刘郇膏完成了整个程序。③ 也就是说，经过试探，李鸿章发现：列强外交官员虽然与吴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作为新的清政府代表，只要能满足列强所欲，正常的交涉仍可延续，不必为撤换吴煦而过多担心交涉的崩坏，进而影响到自身。

如前所述，曾国藩知晓朝廷对自己并不完全信任，深恐排挤吴煦过程中发生意外，反噬自身，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的核心是对吴煦控制洋枪队的忌惮。事情的发展却也正如其所愿。八月下旬，在李鸿章小心授意下，华尔洋枪队调往宁波，镇压太平军。八月二十七日攻击浙江慈溪时，华尔受伤，次日不治而亡。④

几乎同时，曾国藩开始了对何桂清为首的江浙官僚系统的清算。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全面否定了前述江南大营挽留何桂清的呈文，认为经过自己的察访，所谓呈文“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让朝廷放心，抓捕何桂清不会造成军心不稳；他继

---

① 《吴煦禀上海饷需入不敷出各情》，1862 年 7 月 24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524 页。

② 黄芳与黄冕的关系可见《黄芳致吴煦函》，1859 年 8 月 15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1 册，第 166 页。

③ 《遵旨筹办布路斯国换约事宜片》，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55–157 页。

④ 《华尔阵亡请恤折》，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97–99 页。

而非常诛心地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①]意在坚定咸丰帝诛杀何氏的决心。曾氏的另一份奏折则完全坐实殷兆镛加诸江南大僚们的各项罪名，认为"薛焕前为巡抚，则百官之黜陟，军务之兴衰，措置稍乖，关系甚大。今仅为通商大臣，无用人理财之责，事权已轻，关系较浅。其前此办理未善之处，应否免予惩究，出自圣主鸿裁"。也就是准备放弃对薛焕的进一步惩处。对于吴煦则是另一番话语：

> 臣与李鸿章久拟列款参奏，惟苏藩、关道二缺，一时难得接署之人。又，苏常失陷以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劳。且其广交洋商，厚结华尔，吴煦之进退，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不得不周详审慎，三思后行。除俟上海关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将吴煦事迹会折参奏……[②]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正面说吴煦在1861—1862年间使上海免于被太平军攻占，"具有微劳"；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吴煦的离任与否涉及两个因素——对外交涉和洋枪队，吴煦此前"联络洋人""广交洋商"使得一时之间没有可以替代的人，"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是说若吴煦处置不当会导致这支外人主持的军事力量不服从清朝其他官员的指挥，对吴煦的处理只能"周详审慎，三思后行"；处理的时机在于得找一个可以替代吴煦担任苏松太道的官员，找一个可以平衡各方利益的人选取代吴煦担任江苏布政使。

曾国藩的奏折在于向朝廷表明何桂清可杀，吴煦可撤。具体撤换吴煦的时间是在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李鸿章上了七份奏折（片），两份与吴煦有关。在《程学启不能赴援金陵片》中，李鸿章以金陵城下的曾国荃需要援兵，但所辖程学启部正与太平军在黄渡地方激战，只能派"署藩司苏松太道吴煦、前苏松粮道杨坊，督同白齐文赶紧筹措行装，驶往金陵，协力援应"，[③]也就是将吴煦调离上海地方，名为归曾国藩调遣，实由手握重兵的曾国荃看管。在《擢用刘郇膏黄芳片》中，因为吴煦"督带常胜军赴援金陵……其师期之久暂，成功之迟速，未可豫定。该员兼理司、道两缺，关系至要，自应派员接代，以重职守"，奏请由刘郇膏"暂行兼理苏藩司篆务"，由黄芳"暂署苏松太道"。十月初二日廷寄上谕，同意李鸿章各项所请。[④]上谕到达上海巡抚行辕的时间是十月十五日，即1862年12月6日。据《北华捷报》报道，吴煦与黄芳交卸苏松太道的时间是11月28日，[⑤]吴煦离任布政使的时间稍早，是十月初四日，即1862年11月25日。[⑥]也就是说，在接到上谕前，李鸿章就已迫不及待地剥夺了吴煦的权力。吴煦率同洋枪队奔赴金陵是在十天后的12月8日。[⑦]

吴煦的调离给了李鸿章更大的操作空间，昔日下属中有一些人开始投靠、效忠李鸿章。例如上海厘金局委员金鸿保曾遭人弹劾，但转投之后，李鸿章以其"才力精敏，于沪中捐厘各局情形极熟，利弊周知。臣欲整顿厘务，亦不得不暂资熟手"为由，将其保下，并将上海吏治问

---

① 《查复何桂清退守情形折》，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5册，第73–75页。

② 《遵复薛焕吴煦参款片》，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5册，第72–73页。

③ 《程学启不能赴援金陵片》，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112–113页。

④ 查照《上谕档》《实录》均未见此字寄上谕。原文见《程学启不能赴援金陵片》，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113页。黄芳之实授苏松太道时间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见《黄芳补授苏松大道片》，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370页），刘郇膏则于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实授江苏布政使，且非出于李鸿章之奏请。见《清穆宗实录》卷87，同治二年十二月辛巳。

⑤ 《北华捷报》，第644期，1862年11月29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0–391页。中文材料也可以证明，吴煦卸任苏松太道的时间是十月初七（见《附 苏沪军需收支款目开报章程》，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630页）。

⑥ 《附苏沪军需收支款目开报章程》，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629页。

⑦ 《常胜军助攻金陵由沪启程折》，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128页。原文为"十月十六、七等日始经吴煦、杨坊等催促齐备，悉数上船"。转换为西历是12月8–9日。

题推给了前任大僚："苏省吏治，贪诈朋比，积习相沿，皆由一二人倡之于上，才智之士争趋风气，其咎固不尽归之属。"① 这"一二人"所指自是薛焕、吴煦。

而恰在此时，吴煦那方也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件。如前所述，同治元年八月洋枪队一部 600 余人被派遣到宁波与太平军作战，八月二十八日攻击慈溪太平军时遭到重创，华尔死，白齐文随后接替领队。九月中旬，洋枪队大部（4000 余人）被派遣到九洑洲归属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也许是出于缓和与曾国藩关系的考虑，或者说是仍对曾李对自身网开一面有所希冀，"吴煦、杨坊均愿告奋勇前往"。② 但部队拖拖拉拉直至十月二十九方始到达镇江，白齐文则托病仍在宁波，导致未能按照预定规划进驻金陵。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桀骜不驯的白齐文已经花费了租船等费用 15 万余两，加上添购炮械、军火等项开支已近 30 万两。③ 无计可施的杨坊等人想到的办法是暂扣十月军饷，想借此迫使洋枪队按照部署迅速前往金陵。结果却是白齐文于十一月十四日（1863 年 1 月 3 日）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借口没能及时发放饷银而到杨坊寓所，"将杨坊鼻额胸膛打伤，吐血不止，并将预备发饷之洋银四万余元，强行抢去"。④ 这件事暴露出吴煦、杨坊等所谓"督带"有名无实——尤其是洋枪队首领换成白齐文之后。吴煦对于这一点其实也很清楚，知晓白齐文"布置约束逊于华尔多矣"。⑤ 但对外，尤其是在曾、李面前仍是一副智珠在握的形象，到 1862 年 12 月 2 日还自信满满地告知曾国藩、李鸿章洋枪队到达后的行动部署。⑥ 那么李鸿章等人知道内情吗？从现有资料看，至少李鸿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例如在 1862 年 12 月 8 日就曾对吴煦说："该将如此居心，以后如何共事，幸善处之。"⑦ 精明如李鸿章虽然看透，却也不愿向朝廷揭破此层，因为假装不知吴煦、杨坊对洋枪队控制的削弱可以事后更好地打击他们。

事发之后，李鸿章迅速通过吴煦等人与英国驻华军官士迪佛立和美国领事麦华陀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随后于十一月十九日与薛焕会衔上奏。在奏折中，除了报告对白齐文的处理方案："即日解去兵柄，听候中国查办，一面谕令英国前派去帮同教练之兵官名奥伦者暂行接管，俟中外会商派定妥员接替办理"，一面参劾了吴煦、杨坊：

> 该道等札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再，前次拟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派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⑧

片上之后，十二月初四日有字寄上谕，完全支持了李鸿章的处理方案，只是又加了一句："倘再不能认真钳束，即着李鸿章从严参办。薛焕于外国事务素为熟悉，办理均极妥协，该大臣亦当会同商办，以期万全无弊。不得以事权不属，置身事外。"⑨

李鸿章的方案是将洋枪队后续处理的责任完全扔给吴煦、杨坊，并且还要后续承担巨额军

---

① 《复奏曾秉忠金鸿保参案折》，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35–136 页。

② 《奏报常胜军协剿金陵行止片》，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37 页。

③ 《吴煦为偿清英商阿加刺洋行借款详苏抚》，1863 年 9 月 30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547–548 页。

④ 《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59–160 页。此后白齐文还一度投奔太平军，最终于同治四年四月于漳州被抓捕，闰五月死于浙江兰溪的押解赴沪途中。关于白齐文的生平可参阅项立岭：《白齐文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4 期；任智勇：《太平天国洋将白齐文之死考》，《军事历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⑤ 《吴煦致子明函》（底稿），1862 年 10 月 1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2 册，第 366 页。

⑥ 《吴煦上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禀》，1862 年 12 月 2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2 册，第 380–381 页。

⑦ 《李鸿章致吴煦函》，1862 年 12 月 8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2 册，第 389 页。

⑧ 《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59–160 页。

⑨ 《附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寄谕》，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61 页。

火等赔补。朝廷的意思却是将李鸿章、薛焕一起卷了进去：对常胜军的后续处理二人必须一起担责。究其原因，大概是怕李鸿章在整饬吴煦等人过程中进一步将常胜军的事情闹大。事后证明，朝廷的这种处理方案是有一定效果的，至少李鸿章未将事情闹大。

到十二月十日前，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等人签订了十六条常胜军的“整顿”方案，逐步削减外籍军官的权限。剩下的是抓捕白齐文和结算华尔、白齐文自行购买的军火等项开支。① 此片得到批准，上谕中还言明：“此军所需经费，向由中国发给者为数甚巨，均由白齐文自行支用，中国何从派员会算代偿？”也就是坚决拒绝偿付。中枢的坚决态度却无助于解决问题，面对各洋行的要债，上海方面的各大员处理方案是“委屈”吴煦等人：“所有前项轮船租价，应责令督带常胜军吴、杨二道自行赔补，不准开销税款。所有十月、十一月内提还关税若干，应饬吴道等解还归款。其阿加剌洋行借项，下欠若干，并由吴道等清结。”为此，“现银三十一万一千余两，又英洋六万三千余元，均系……（吴煦、杨坊）各半认赔”，而阿加剌洋行的十万两规银则由吴煦自同治元年十月至二年七月每月一万，共计独自赔 10 万两。② 也就是说，在李鸿章的设计之下，仅常胜军案，吴煦就赔补了 26.9 万余两。

吴煦被革职后，曾国藩、李鸿章虽并未赶尽杀绝，但针对吴煦的各种小动作依然不断，尤其是要求他清理离任前经手的各种文报、档册。③ 因集团中缺少足够资历、能力的替补官员，湘淮系还被迫启用薛焕、吴煦的下属。如黄芳于同治三年正月“患怔忡之症”被迫开缺回籍，续署苏松太道的是与薛、吴关系密切的应宝时（浙江籍）。④ 李鸿章亲信丁日昌接任时，已是同治三年五月十一日。⑤

1863 年之后，吴煦回到杭州，也主要居住于此。从 1862 到 1872 年他死前，可知他做的主要事情是：于同治六年“垫发军需作为捐输，广中额五名”，⑥ 在当时的情境中无疑是为桑梓作出了贡献；为同乡龚自珍刊刻了《定庵文集》，算是为龚自珍正名。⑦ 当然，作为理财达人，他还是不断接受昔日同僚下属的咨询、顾问，如后任苏松太道应宝时就不时与他来往信函，讨论漕粮海运问题。⑧ 被他寄予厚望的嫡子吴宗麟也一直科场、官道困顿，虽然身为父亲的吴煦为其作出了多番努力。

1872 年，吴煦黯然离世。1873 年初，上海 – 苏南的官绅冯桂芬（上海人）、潘道祁（苏州人，曾避兵灾于上海）以吴煦“勤政爱民”“力任艰危”为由，呈请李鸿章上奏于上海为其“捐建专祠”。排挤了吴煦的李鸿章明白此时吴氏已经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为顺洽舆情于二月十七日上奏，寻即得到允准。⑨

总而言之，在湘军东进过程中，自知无力抗拒的吴煦等人未尝没有投效之心：无论是 1861 年的乞师，还是 1862 年的进军九洑洲，都可视为示好、投效之举。但曾、李的决心已定，源源不断地对江浙集团的弹劾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弹药，最终借助同治二年底白齐文“殴官夺饷”之事将他们革职，追赔款项，彻底逐出了官场。

---

① 《整饬常胜军片》，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170 页。

② 《吴煦为偿清英商阿加剌洋行借款详苏抚》，1863 年 9 月 30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547–548 页。

③ 《关税留抵军饷折》，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307–309 页。

④ 《黄芳开缺苏松太道片》，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 1 册，第 505 页。

⑤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4 册，同治三年五月十一日条，第 158 页。

⑥ 《钦定科场条例》卷 24，光绪三十年编，无版本信息，第 39 页。

⑦ 这部龚自珍文集共七卷。另有学者认为其中的《定庵续集》1–4 卷系出自龚氏食客曹籀之手。见孙静：《吴煦刻〈定庵续集〉文稿来源小议》，《文学遗产》1989 年第 1 期。

⑧ 《吴煦致应宝时函》（底稿），1866 年 7 月 7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555–557 页。

⑨ 《吴煦请建祠折》，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 5 册，第 326 页。

四、结语

吴煦某种程度上可以算做近代史上的失踪者：在吴煦家藏档案现世前，学界对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清史稿》中对他多有讲述，但多记述他在中外交涉中的行为，不见他经世之能；当湘淮系在同光中兴叙述体系凸显，他成了反面的典型。吴煦再成为关注的焦点要到 1953 年 1 月 27 日。那天，他的重孙将祖上留下的“废纸”卖给了收购旧货的邻居，这些资料经层层转折最后被收入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其中部分于 1983 年以《吴煦档案选编》（共 7 册）为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① 吴煦自此再次回到公众和历史学界的视野。

在吴煦上得高位的 1860 年前后，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达成了战略平衡，但在体制上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何桂清作为封疆大吏插手了钦差大臣和春的军务，这一面是他圣眷正浓，另一面则是他掌握着巨大的财权，掌握着后勤。江浙方面依然遵守着文武分途的体制：文官们可以通过粮饷的供给驱使武官去做某些文官们自认为正确的事，他们依然不能，也不会直接带兵。湘军系统与之不同，士大夫带兵是他们的制度保证，可以部分革除日常“喝兵血”，可以减少发生“胜时争功，败时不救”的现象。这两套体制在何桂清大败之前并不存在高下问题——在当时只有一个标准：是否能镇压太平军。随着战争局面的转变，湘军依靠在江苏西线的胜利而进入苏南。于江浙官员来说，控制粮饷驱使部队作战是他们的惯例，在经制军队和团练不可靠之余，洋兵助剿是可能的选项。或者说，用粮饷驱动本国团练、经制军队，与驱动外籍雇佣军，甚至是外国政府军，在他们的思考逻辑上并无区别。吴煦在 1860 年底抱怨：“助剿本有成说，奈北地无人担承，有机不乘，有路不走，实内廷之大病也。”② 这就是他们的心声。“借师助剿”是此时江浙官僚集团思考逻辑的结果，也是他们自身面对湘系压力的主动措施——国家尊严以及后患不在考虑范围之内。③

在 1850 年代中后期，何桂清、王有龄在浙江、江苏两省的轮流任职（何桂清咸丰七年由浙江巡抚任两江总督；王有龄咸丰七年由浙江按察任署理江苏布政使，咸丰十年升浙江巡抚）带动了一大批官员在浙江、江苏两地的调任，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官僚集团。与此同时，上海的商人群体不再是广东人独大，江浙商人大规模涌入上海，如宁波籍的杨坊④ 等人已然逐步取代早期的广东商人。⑤ 他们在官商两界取得优势，这自然更有利于两地官僚的联合。一群善于理财的官员与新旧江浙商人之间的联合，形成了上海财赋剧增的局面，也支撑起庞大的粮饷开支。这种结合影响了此后的湘淮系主政江南的决策：一面是必须排挤掉吴煦等江浙官商集团的头面人物，一面则是想要继承庞大的税收。1863 年后，他们的目标大抵成功，其结果是湘淮军的武力、江浙的财力、湘淮系的“洋务”话语相结合，构成了他们自成一体的权力结构，成为了晚清数十年间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

湘淮系排挤试图投靠的吴煦同样使自己失去了江浙绅商集团的信任，加上湘淮系自身在用人方面的狭隘性——不愿信重外省人士，导致他们政治势力扩张的同时，理财方面没能较大增

---

① 关于吴煦档案的流转和出版情况，可参阅郭存孝：《简论吴煦及其档案》，《浙江学刊》1992 年第 5 期；王巨安：《吴煦档案发现始末及其真相》，《兰台世界》2007 年第 19 期；韩李敏：《吴煦档案——解放以来我国首次档案大发现》，《浙江档案》2014 年第 3 期。

② 《吴煦为浙丝捐移湖州办理上王有龄禀》（底稿），1860 年 12 月 23 日，《吴煦档案选编》第 6 册，第 385–386 页。

③ 茅家琦（《试析咸丰帝拒绝“借师助剿”的原因》，《历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等诸位前辈探讨了咸丰帝与湘系等官僚士大夫反对借助列强的原因，但没有注意到江浙官僚集团行动的背后逻辑。

④ 关于杨坊的生平，可参见杨晓童：《人生轨迹与宦海沉浮：杨坊初步研究》，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⑤ 关于 1840—1860 年代上海商人群体的演变，可参阅陈正书：《上海通史》第 4 卷《晚清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24–245 页。

长，无法如吴煦主政时那般大幅拓展财源。而财政无法大幅扩张，对于此后半个世纪中被迫近代化的清政府的运作和湘淮系自身的命运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周育民、朱浒、吴佩林等师友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References

Chen Zhengshu. *Shanghai tongshi: wanqing jingji juan* (Shanghai general history: the volume of late Qing economy)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21.

Gu Tinglong and Dai Yi eds. *Li Hongzhang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i Hongzhang).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2008.

Long Shengyun. *Xiangrong shiqi de jiangnan daying* (Jiangnan camp under Xiangrong). Beijing: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1.

Wang Kaixi. *Cixi chuilian: qixiang zhengbian shimo* (Cixi “behind the veil”: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qixiang* coup).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2014.

The War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Jiangnan between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Focus on Wu Xu

REN Zhi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Chinese Customs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rzy1973@126.com)

Abstract: In the mid-1850s, Jiangsu and Zhejiang bureaucrats and gentry group gradually coalesced. Led by Wu Xu, this group cooperated well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entral authority such as He Guiq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bureaucratic and gentry collaborations mad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finance and relied on the internal strif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After 1860, the resurgent Taiping Army defeated He Guiqing, and Zeng Guofan took control of Jiangna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Xianfeng’s emperor’s dissatisfaction with He Guiqing, as the officials and gentr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tried to protect the He family, Zeng Guofan and Li Hongzhang gradually rectify officials in Jiangnan. Although Wu Xu intended to seek refuge with Zeng Guofan, he was eventually expelled from officialdom. Although the Xiang-Huai clique wielded military power and had a discourse of self-improvemen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fficials and gentr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was not harmonious, and they ultimately failed to make greater breakthroughs in finance, which limited the futur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Keywords: Wu Xu, He Guiqing, Zeng Guofan, Xianfeng reign